

清代诸子学研究

刘仲华◎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
社会科学理论
著作出版基金
资助



清代诸子学研究

刘仲华◎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诸子学研究/刘仲华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ISBN 7-300-05881-7/K·267

I. 清...

II. 刘...

III. ①先秦哲学-研究②哲学思想-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B220.5②B249.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7415 号

清代诸子学研究

刘仲华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11.75 插页 1

印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70 000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文化产生、发展的漫长进程中，曾经出现过两个辉煌灿烂的历史时期，一个是春秋战国，还有一个是明清之际。前者正值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伴随政治制度和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思想文化领域内诸子各家学说蜂出并起。它们各执一端，各造其极，既相互辩难，又互为发明，由此而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第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成为后世学术文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而明清之际，同样也是中国社会发生急速变动的历史时期，朝代更迭，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在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斗争中，在严酷的血与火的洗礼中，以经世致用为宗旨、

以挽救社会危机为目的、以朴实考经证史为方法的实学思潮勃然兴起。众多的思想家、学者站在瞬息变化的社会潮流的前面，深刻地观察现实，批判地总结过去，抒发新颖的思想观点，提出不同的学术主张，设计各种各样的救世方案，整个学术思想界风起云涌，异彩纷呈，一派繁荣热烈的景象，堪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相媲美。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清之际各种思想主张共同汇成的实学思潮交响乐中，先秦诸子学的复兴，构成了其中一个跃动的独特音符。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崛起，曾经完美地绽放出足以令后人赞叹神往的中国远古文明的初曙；那么，明清之际诸子学的复兴，则堪为传统文化高度衰落时期迸发而出的灿烂霞光。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文化史上，它们都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或许历史确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汉代以后，随着儒家学说的独尊，诸子的地位一落千丈，成为儒学或经学的附庸，甚至被视为“异端”；而清初以来，伴随学术潮流向经学的回归，一度复兴的诸子学，也被淹没在以经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考据学洪流中。虽然如此，追本溯源，先秦诸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仍然是任何学说和学派都无法掩盖、也无法取代的；先秦诸子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也同样是源远流长、至深至巨的。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人们认识的深化，诸子学说本身的内容和价值日渐凸显，对诸子各家的研究也逐渐为学术界所重视。继明清之际诸子学初步复兴，学者提出“经子平列”的主张之后，清代中叶，适应考据学发展的需要，学者广泛运用子书来考证经书乃至史书，与此同时，还对子书本身做了大量训诂、校勘、辨伪、辑佚、考证的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进而对诸子学说展开专门的研究，或阐发其义理，或重评其价值。正是在乾嘉学者的努力下，不仅子书成为考经

证史的重要依据，而且子学本身也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近代以降，经历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先秦诸子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学者或深入钻研各部子书，或直接提倡“通子致用”，或反复论证“西学源于诸子”，甚而大胆借用诸子学说阐发变革图强的政治主张。可以说，在中外社会环境和古今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中，在新学、旧学、中学、西学彼此之间的论争碰撞和交汇融合中，先秦诸子的多元价值和现代意义日益彰显。所有这些，都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评诸子、批判传统以及其后诸子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20世纪以来迄今，对先秦诸子的研究成为举世瞩目的专门学问，研究者众多，学术成果丰硕。比较而言，直接和间接引发这一研究热潮的清代诸子学仍“养在深闺人未识”，尚未引起学者的注意，更谈不上发掘和研究。实际上，清代诸子学的复兴和发展，不仅于今天的诸子学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而且其本身也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换言之，清代的诸子学，无论是其兴起和发展，抑或是其成就和贡献，都是有清一代学术文化领域的重要现象，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特别是清代学者对子书的训诂、校勘、辨伪、辑佚和考证，使长期以来散失亡佚、残缺脱误乃至难以卒读的先秦子书得到了空前的发掘整理和系统的疏通证明，直接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郭沫若有言：“欲尚论古人或研讨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读随园诗话札记》）同样，有关先秦诸子的研究，如果忽略清人的成就，忽视清代的诸子学，也是十分遗憾的。就此而言，探讨清代的诸子学，不仅有助于拓展清代学术思想文化研究的领域，而且有利于开展对先秦诸子本身的深入研究。可喜的是，近年来，清代诸子学日益引起学术界的

重视，并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首先是近代诸子学受到关注，出现专门的研究论著，继而是对清代中叶、明清之际乃至整个清代诸子学研究的开展。刘仲华的《清代诸子学研究》，就是在这一领域的有益尝试。

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清代诸子学的专著，本书十分注重从宏观上把握有清一代诸子学的发展脉络和总体面貌，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明清之际、清代中叶以及晚清时期诸子学产生、发展、变化的不同情形，揭示出其在各个阶段的成就与特色。特别是对此前学术界多所忽略的清代中叶的诸子学，从考证方法、典籍整理、义理阐释乃至学术重建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不少具有创新意义的见解。以乾嘉学者“以子证经”、“以子证史”的考证方法为例。本来，治学兼及诸子百家，并非清代学者所独具，历代通儒大家率皆如此；并且，利用先秦诸子考证经史的做法，也并非肇始于清代考据学。但是，正如考据非清代所独有，但考据成为一门学问，形成一个学派，成为一种学术潮流，却非清代莫属。同样，以子证经、证史在清代考据学形成以前，并未成为一种系统的考证方法，而且运用也不广泛。清代则不同，在明末清初以来学术自身内在矛盾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在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伴随学术潮流向传统经学的回归，“推本原始”也成为学者的普遍追求。出于考证六经以及古史的需要，先秦诸子以其时代与六经、上古同时或相近而独具其价值，并由此而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从清初至清末，学者在考经证史之时，大多十分认可并主张利用先秦诸子的材料。特别是乾嘉时期的学者，诸如汪中、焦循、王念孙、王引之、毕沅、孙星衍、阮元等人，都极为重视先秦子书，并广泛利用其中的材料考证经史，阐发义理，甚至训诂字书，解释

虚词，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其流风所及，一直延续至近代，并影响到俞樾、孙诒让、王先谦诸大家，以至清末学者在总结一代学术成就及其研究方法之时，明确提炼出“以子证经”、“以子证史”的考证方法，并将其视为乾嘉考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此类，作者的这些分析和结论，大多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深入考察的基础之上，既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又颇有发明，颇具新意。

《清代诸子学研究》一书，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充分吸收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再加修改补充完善而成的。作为导师，亲眼目睹清代学术文化领域新的研究成果的问世，亲身感受到清史学界新的有生力量的成长，内心的欣慰之情是不言而喻的。我由衷地祝愿刘仲华同志继续努力，再创佳绩，为进一步推进清史特别是清代学术文化史的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黄爱平

2004年7月

于中国人民大学宜园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一、诸子释名	(1)
	二、子书分类	(5)
	三、子学源流	(13)
第二章	明清之际子学与传统学术的再蜕变	(23)
	一、学术风尚与子学兴起的条件	(24)
	二、学术转型中的子学研究	(46)
	三、时代关怀与子学的重新定位	(72)
	四、明末清初子学的学术境遇	(93)

第三章	以子证经、史与“推本原始”的追求	(99)
	一、考据方法的完善	(103)
	二、子与经、史的关系	(107)
	三、以子证经	(111)
	四、以子证史	(133)
第四章	子书的整理与校勘	(144)
	一、校勘	(144)
	二、辑佚	(169)
	三、辨伪	(176)
第五章	乾嘉子学义理与问题的重新阐释	(191)
	一、重新定位的荀子	(191)
	二、复活的墨学	(209)
	三、入世的道家	(222)
	四、“德主刑辅”之下的法家	(248)
第六章	乾嘉子学与学术重建的局限	(260)
	一、考据与义理的追求	(261)
	二、从“异端”向“六经羽翼”的回归	(267)
	三、“攻乎异端”：对诸子思想的吸收	(277)

第七章	诸子学与晚清学术	(292)
	一、子书整理的进一步发展	(293)
	二、走出考据与子学经世	(308)
	三、会通中西	(316)
	四、批判传统	(322)
附录	清代诸子学著作目录	(338)
参考文献		(357)

第一章

绪 论

一、诸子释名

“子”，《说文解字》曰：“子，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人以为称。”“子”的最初意思是指普通的人。后来，其义引申为对男子的通称，颜师古说：“子者，人之嘉称，故凡成德，谓之君子。”这样，“子”又作为尊敬词出现。古代弟子称其师为夫子，如孔子、孟子、老子等。也有同辈互称为某子的，如孔子之称蘧伯玉、公叔文子，子贡之称原思，庄子之称惠施。清代汪中论及“子”字时说：“古者孤、卿、大夫，皆称子；子不成词，则曰夫子。夫者，人所指

名也，一夫配子，取足成词。凡为大夫，自适以下，皆称之曰子。孟献子穆伯之孙，穆伯之二子，为其诸父而曰夫子。崔成崔强，称其父，亦曰夫子。故知其为大夫者，例称夫子。”^①

春秋战国时期，私家学术大量涌现，学者辈出，但当时载其言行的书籍大多不是本人亲自编定，而是由后世弟子录其言行，缀辑成书。因此，书中多有子、夫子、某子、子某子等称呼，书名也大多直接称为某子。当时学者不只一位，其书也不只一种，所以以“诸子”称之。西汉初年，开始大规模整理书籍，直到刘向撰《别录》，“条其篇目，撮其指意”^②，大多数的诸子书名称开始确定。但其命名标准并不统一，“凡子上标氏，如管子、庄子、漆雕子、王孙子者，其通例也。有连名氏或字者，如孙卿子、皱奭子、公孙尼子、公孙龙子。有以年老名者，如老子、老莱子、老成子。有以所服名者，如鶡冠子。有以所居名者，如鬼谷子。有冠以国名者，如齐孙子、魏公子。有以其官名者，如关尹子、青史子”^③。刘向之子刘歆继承父业，总群书而成《七略》，其中专设《诸子略》，“诸子”始成为先秦各家学派的总称。后来史家著录书籍，将诸子扩充，至《隋书·经籍志》承荀勖《新簿》而定名“子部”，于是所谓“子”者，与经、史、集并列，而成为一类书籍的专门名称，其内容包括诸子九流以及兵书、医术、方技乃至佛道之书。

子书在中国古文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研究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的基本文献。尤其是先秦诸子，起于春秋，盛于战国，

① 汪中：《述学》。

② 班固：《汉书·艺文志》。

③ 罗竣：《诸子学述·总论》，4页，长沙，岳麓书社，1995。

各家都持之有故，言之有理，是所谓的专家之学、义理之学。后世所谓子书，内容繁杂，或者祖述先秦之说；或者是自然科学中的一种专门知识，如天文、数学等；或者是宗教书籍，如佛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先秦诸子学说在汉以后逐渐衰微，研习者寥寥。因此，一提起子学，人们往往以先秦诸子为核心，吕思勉说：“子书之精者，讫于西汉。东汉后人作者，即觉浅薄。然西汉子书之精者，仍多祖述先秦之说，则所谓子书之作，讫于先秦可也。然远求西周以前，则又无所谓子，然则子者，春秋战国一时代之物也。”^①

子与经、史、集，既有同也有异。西周以前，无所谓经史子集，书籍只有传说中的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到了周代，文化才开始有相当的发展，各种社会制度始具相当的规模。孔子所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周代传世册籍比较丰富，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首推“六艺”，即《易》、《书》、《诗》、《礼》、《乐》、《春秋》，但这时“六艺”仍然只是六艺，还没有称其为“经”。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古代社会开始进入重大变革时期。在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变革运动中，“士”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他们为时代所激荡，纷纷著书立说，招徕门徒，扩大影响，因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新的思想、学说、派别及其著述“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立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②。于是，社会上出现一批私家著述，即

① 吕思勉：《经子解题》，88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② 《汉书·艺文志》。

先秦诸子。在诸子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各学派有争有合，尊奉“六艺”为经典的儒家逐渐取得一统的地位，这时经、子之别开始出现。随着儒家思想独尊势力的形成，其尊奉的“六艺”也一跃而居群书之首，名曰“经”。《庄子·天运篇》说：“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与此相比，其他百家书便成了“六经之鼓吹”的“诸子”。但在西汉时，《论语》、《孝经》仍然以“传”，《尔雅》以“小学”各附于经，而《孟子》则更在诸子儒家中。四分法形成以后，《论语》、《孝经》、《尔雅》径直列为经。后来，《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而《春秋》则有《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三传之分。《孟子》本来列于“诸子”儒家之中，宋代以后，由于理学发展的需要，《孟子》一跃而入于经部，到南宋时正式确立，五经成为十三经。^①章太炎说：“经多陈事实，诸子多明义理。”^②从载言的内容上讲，“经”大多记载三代的先王事迹与典章制度，所谓“六经皆史也”。“史”，“记事者也”^③，以《春秋》为祖，作为书籍类别，其出现晚于经、子，主要记载历史事实。“子”，大多是一家之言。“集”，出现的比较晚，其学术流别，往往兼搜并采，不名一家。一般认为，子学衰微而集部兴起，至于“子”与“集”的区别，“集为一人之著述，其学术初不专于一家；子为一家之学术，其著述亦不由于一人”^④。不过，在古人眼里的经、史、子、集以及其排列次序，绝对没有这样单调，“经”不但

① 五代时蜀主孟昶刻石经，将《孟子》列入，这是孟子列入经部的开始。宋代理学兴起以后，喜言心性，而且大都宗孟子性善之说，而《大学》言心，《中庸》言性，又是孟子学说的渊源所出。因此宋代特尊《孟子》为经。

② 《与章行言论墨学第二书》，载《华国月刊》第4期，转引自《经子解题》，100页。

③ 许慎：《说文解字》。

④ 《经子解题》，88页。

是先王之遗迹，而且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①，可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②。“子”虽“有所偏”，“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至于“集”，“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③。经以载道，子史百家乃道之羽翼，这是传统学术中经、史、子、集分类和排列的主旨。

二、子书分类

子书是我国经、史、子、集图书总类中的四部之一。在目录学发展史上，“子部”的确立和内涵经历了一个发展与变化的过程。最早将“诸子”作为图书分类是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汉书·艺文志》载：“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刘歆承其父刘向，领校秘府之书，最后写成《七略》。七略，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其中辑略是其总论，以下六略即分古书为六类。《七略》中的划分，是以书籍的性质为标准的。六艺即六经，居于群书之首。六艺略之后便是诸子略，诸子略共分十家，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刘向、刘歆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奠基人。《七

① 《文心雕龙·宗经篇》。

②③ 《隋书》卷三二，《经籍志》。

略》所创立的著录法也成为后来图书分类法的基础。正如章学诚在《校讎通义》中所说：“刘《略》班《志》，乃千古著录之源流。”而作为“六经之支与流裔”的“诸子”也一直位居其一。

随着学术的发展和书籍的增加、散亡，汉以后对书籍的划分又在《七略》和《汉书·艺文志》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变化，这便是“四部”的创立。“四部”创始于西晋荀勖的《中经新簿》，荀勖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作《中经新簿》十四卷，分为甲、乙、丙、丁四部，一曰甲部，有六艺及小学等书，相当于后来的经部；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诸子家、兵书、兵家、术数，相当于后来的子部；三曰丙部，有史记、皇览簿、杂著，相当于后来的史部；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相当于后来的集部。^①这是最早按四部分类的书目。《中经新簿》完成后不久，遭“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秘阁藏书，毁损殆尽。东晋偏安江右，重新搜集群书，著作郎李充“于时典籍混乱，删除繁重，以类相从，分为四部，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②。李充把荀勖四部的乙、丙两部前后次序作了调整，即乙部为史书，丙部为诸子。此后，“子”在四部中的次序正式确立，正如钱大昕所说：“晋荀勖撰《中经新簿》……四部分之，实始于此，而乙部为子，丙部为史，则子犹先于史也。及李充为著作郎，以典籍混乱，删除繁重，以类相从，分为四部，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而经、史、子、集之次始定。”^③此后，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秘

① 参见《隋书》卷三二，《经籍志》。

② 《文选》，“王文宪集序”，注引臧荣绪《晋书》。

③ 钱大昕：《潜研堂集》卷一三，《答问十》。